

乡村振兴视角下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的优化路径及对策建议研究

——以郫都区为例

杨婷婷

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8日

摘要

推动农业绿色转型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而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全新动能。文章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以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为典型案例, 在系统梳理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绿色转型理论内涵的基础上, 构建了“技术赋能-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制度保障”四维分析框架, 并基于农户微观调查数据, 运用熵权法与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技术采纳程度和社会化服务参与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分维度来看, 结构优化维度的赋能效应最强, 制度保障维度次之; 异质性分析显示, 规模经营户、受教育程度较低农户及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受益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论, 从强化技术推广、优化供产销一体化链条、完善绿色政策保障、激发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农业绿色转型, 乡村振兴, 郫都区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Empowered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Pidu District

Tingting Yang

文章引用: 杨婷婷. 乡村振兴视角下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的优化路径及对策建议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7): 403-412. DOI: 10.12677/ass.2026.157587

Abstract

Promot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s a key pathway to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s an advanced form of productive forces driven primarily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vide fresh momentum for this green transform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takes Pidū District in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Building up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green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prising “technology empowerment-efficiency enhancement-structural optimization-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Drawing on micro-level survey data from farming households, the study employs the entropy weighting method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s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green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degree of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ized services exerting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s. When analyzed by dimension, the empowerment effect is strongest in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dimension, followed by the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dimens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large-scale farming households, farmers with low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ose who have joined cooperatives benefit more significantl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strengthening technology extension, optimizing the integrated supply-production-marketing chain, improving green policy safeguards, and stimulating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s.

Keywords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Pidū Distric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可持续发展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乡村发展全局。当前，我国农业正经历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耕地退化、面源污染、碳排放压力等问题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学界与政策界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破解农业高碳低效困境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该概念强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技术突破、要素配置优化和产业深度转型，推动生产体系的重构。在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不仅体现为数字技术、智能装备、生物育种等前沿技术的应用，更意味着劳动者素质、劳动资料形态和劳动对象范围的全方位跃升。这一生产力质态与农业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后者本质上是一场从高碳低效向低碳高效、从资源粗放消耗向集约节约利用、从环境负外部性向生态正外部性的系统性变革。

因此,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2.1.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与测度

新质生产力的学术探讨自 2023 年以来迅速升温,研究视角从宏观话语阐释逐步向微观机制分析深化。内涵上,魏崇辉强调教育、人才与科技协同[1];周文等指出其是以颠覆性技术突破超越传统生产力的质态[2]。农业领域,李春顶等认为其通过优化三要素配置推动绿色转型[3];高鸣等强调要素创新配置与结构升级[4]。测度上,金华丽等基于县域面板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法,发现新质生产力显著促进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5];崔雪锋等采用熵权 TOPSIS 法测度省域水平,识别出“东强西弱、沿海集聚”的总体格局[6]。现有研究为量化评估提供了基础,但宏观数据难以捕捉农户层面的技术采纳与绿色生产意愿,亟需微观调查补充。

2.2. 农业绿色转型的内涵与路径

农业绿色转型是涵盖全环节的系统工程。金书秦等通过历史与理论分析,提出农业绿色发展面临战略、战术、战法三个转变[7];仇焕广等梳理政策进展,指出需在保障粮食安全基础上实现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8]。机制方面,黄凤等基于“刺激-反应”模型识别出适应性演化、主体协同等驱动机制[9];郑军等运用熵权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发现数字普及度、科技创新等对三产融合与绿色转型适配度有正向影响[10]。路径研究上,罗光强等利用动态 QCA 方法归纳出“市场+技术”、“多元主体协同”等三类组态路径[11]。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宏观路径识别,对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的关注仍显不足。虽然这些研究从不同维度揭示了农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机制,但多侧重于宏观路径识别,对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的关注仍有不足。

2.3.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的文献进展

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绿色转型的关联研究近年来逐步兴起。理论层面,于法稳构建了“技术-效率-结构-制度”四维赋能框架,揭示其驱动全产业链低碳化转型的内在机理[12];胡钰从劳动者、劳动资料、要素组合角度阐释了赋能路径[13];戴小文等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视域下进行了系统分析[14]。实证层面,赵向豪等采用熵权法、SBM-GML 指数及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发现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绿色技术进步和社会化服务推动转型[15];张可馨等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证实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升级是其促进农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传导机制[16]。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在宏观尺度取得了丰富成果,也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借鉴。

2.4. 理论框架构建

农业绿色转型不仅是技术效率问题,更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同演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会要求生产关系相应调整;而在农业技术社会学视野下,技术采纳并非线性扩散,而是嵌入于农户的社会网络、制度环境与价值认同之中。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驱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对农业绿色转型的赋能过程,恰恰体现了“技术-制度-行为”的交互演化逻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技术赋能-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制度保障”四维分析框架,用以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逻辑。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 H1: 新质生产力对郫都区农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 H2: 技术采纳程度在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绿色转型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 H3: 社会化服务参与在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绿色转型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主要基于三点考量：一是研究涉及农户主观认知、行为意愿等微观变量，需结构化问卷测量；二是县域统计年鉴数据有限，抽样调查可获取足量微观数据；三是为拓展既有宏观面板研究的分析视角，将问卷数据与熵权法、多元回归相结合，构成方法上的有益补充。

3.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郫都区位于成都平原腹地，是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其特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优势，作为成都市乡村振兴集成示范区和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享有市级以上绿色农业补贴、智慧农业试点等多项政策倾斜；二是区位优势，紧邻成都中心城区，交通便利，农产品可通过都市圈短供应链快速实现优质优价，绿色技术推广的市场激励较强；三是产业基础优势，辖区内拥有川菜产业园、多个农产品电商基地，产业链配套较为完善。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按农业产值选取安德街道、唐昌镇等6个乡镇(街道)，每地随机抽取60~70户，入户面访。共发放问卷400份，获有效样本357份，有效回收率89.25%。

3.3.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度

问卷基于理论框架并参考成熟量表设计，涵盖农户特征、经营、技术应用、效率、产业融合、政策服务、绿色生产等模块，核心变量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绿色转型综合指数(AGT)，从生产低碳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产品供给绿色化三个维度构建20个指标，采用熵权法赋权；核心解释变量为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数(NQF)，从技术赋能、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制度保障四个维度构建27个指标，同样以熵权法赋权。中介变量包括技术采纳程度(TECH)和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SER)，各通过5个题项测量并取均值；控制变量则涵盖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经营规模与年限、收入水平以及是否加入合作社。

3.4. 模型构建

为检验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AGT = \beta_0 + \beta_1 NQF + \sum \gamma_i Control_i + \varepsilon_0 \quad (1)$$

为检验中介效应，参照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构建递归方程：

$$TECH = \alpha_0 + \alpha_1 NQF + \sum \alpha_i Control_i + \varepsilon_1 \quad (2)$$

$$AGT = \beta'_0 + \beta'_1 NQF + \beta_2 TECH + \sum \beta'_i Control_i + \varepsilon_2 \quad (3)$$

对社会化服务参与的检验同理。此外，为探讨不同因素的调节效应，在异质性分析中引入交互项模型：

$$AGT = \theta_0 + \theta_1 NQF + \theta_2 Edu + \theta_3 (NQF \times Edu) + \sum \theta_i Control_i + \varepsilon_3 \quad (4)$$

其中，Edu为受教育程度，NQF×Edu为交互项， θ_3 反映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效应的教育调节作用。同理可检验合作社参与的调节效应。所有分析使用Stata 19.0软件完成。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信效度检验与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数据均来自农户自我报告，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在问卷设计阶段通过匿名

作答、反向计分题设置、题项顺序随机化等手段进行程序控制；在数据分析阶段，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统计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的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8.45%，低于 40%的临界值，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数据质量可靠。

量表信度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评估。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各维度 α 系数分别为：技术赋能 0.823、效率提升 0.856、结构优化 0.791、制度保障 0.868；农业绿色转型各维度 α 系数分别为：生产低碳化 0.834、资源利用高效化 0.847、产品供给绿色化 0.812；中介变量技术采纳程度为 0.779、社会化服务参与为 0.801。所有维度 α 系数均高于 0.7 的可接受标准，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效度检验方面，KMO 值为 0.862，Bartlett 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4856.32 ($p < 0.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量表结构效度良好。

4.2. 熵权法评价结果

基于熵权法客观赋权，计算得到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数(NQF)和农业绿色转型综合指数(AGT)。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NQF 均值为 0.609，标准差为 0.183，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AGT 均值为 0.498，标准差为 0.141，最小值为 0.034，最大值为 0.917。这表明郫都区农户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农业绿色转型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样本内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从农业绿色转型各子维度来看，生产低碳化指数均值为 0.512，资源利用高效化指数均值为 0.487，产品供给绿色化指数均值为 0.495。资源利用高效化维度得分相对较低，反映出秸秆还田、农膜回收、粪污资源化利用等资源循环利用行为仍有待加强。

4.3. 基准回归结果

表 1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仅控制农户基本特征，模型(2)加入全部控制变量，模型(3)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数(NQF)的回归系数为 0.550，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假设 H1 得到验证。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每提升 1 个单位，农业绿色转型指数平均提高 0.550 个单位，赋能效应较为明显。

Table 1.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data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数据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NQF	-	-	0.550*** (20.084)
gender	-0.003 (-0.302)	-0.002 (-0.198)	-0.000 (-0.002)
education	0.018*** (3.456)	0.022*** (4.012)	0.024*** (4.367)
scale	0.001*** (4.523)	0.001*** (4.456)	0.001*** (4.374)
cooperative	0.042***	0.038***	0.037***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控制变量方面，受教育程度(education)的系数为 0.024，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其农业绿色转型程度越高，人力资本积累对绿色生产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经营规模(scale)的系数

为 0.001，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推动农业绿色转型。是否加入合作社 (cooperative)的系数为 0.037，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合作社组织在推广绿色技术、提供社会化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4. 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2. Data on the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analysis
表 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数据

效应类型	估计值	Bootstrap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占总效应比例
技术采纳中介效应				
间接效应	0.089	0.015	[0.060, 0.119]	16.12%
直接效应	0.461	0.031	[0.402, 0.521]	83.88%
总效应	0.550	0.027	[0.497, 0.603]	100%
社会化服务中介效应				
间接效应	0.059	0.014	[0.032, 0.087]	10.79%
直接效应	0.491	0.030	[0.431, 0.550]	89.21%
总效应	0.550	0.027	[0.497, 0.603]	100%

注：Bootstrap 重复抽样 5000 次。

技术采纳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表 2)：间接效应估计值为 0.089，Bootstrap 标准误为 0.015，95% 置信区间为[0.060, 0.119]，不包含 0，表明技术采纳的中介效应在统计上显著。直接效应估计值为 0.461，95%置信区间为[0.402, 0.521]，同样显著不为 0。因此，技术采纳程度在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绿色转型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假设 2 得到验证。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16.12%。

社会化服务参与的中介效应同样采用 Bootstrap 方法检验。结果显示：间接效应估计值为 0.059，Bootstrap 标准误为 0.014，95%置信区间为[0.032, 0.087]，不包含 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直接效应估计值为 0.491，95%置信区间为[0.431, 0.550]，显著不为 0。因此，社会化服务参与在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绿色转型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假设 3 得到验证。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10.79%。

综合两项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的总效应为 0.550，其中直接效应约占 70%~84%，间接效应约占 16%~30%。技术采纳的中介效应(16.12%)略大于社会化服务参与的中介效应 (10.79%)，表明技术采纳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的更重要传导渠道。

4.5. 分维度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识别新质生产力各维度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将技术赋能、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制度保障四个维度的子指数分别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结果显示，四个维度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结构优化维度的系数最大(0.416)，表明产业链延伸、订单农业、电商销售等新业态发展对农业绿色转型的拉动作用最强。制度保障维度次之(0.312)，反映出政策补贴、社会化服务等制度安排对绿色生产的重要激励作用。效率提升维度系数为 0.217，技术赋能维度系数为 0.197，二者相对较小但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在郾都区单纯的技术投入和效率改进对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有限，而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制度保障构建“绿色生产 - 品质溢价 - 激励强化”的良性循环，是实现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

Table 3. Data on 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表 3. 分维度回归结果数据

变量	模型(8)技术赋能	模型(9)效率提升	模型(10)结构优化	模型(11)制度保障
NQF_tech	0.197*** (4.733)	-	-	-
NQF_eff	-	0.217*** (5.616)	-	-
NQF_stru	-	-	0.416*** (9.160)	-
NQF_inst	-	-	-	0.312*** (7.950)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所有模型均包含控制变量。

4.6. 异质性分析

为考察新质生产力赋能效应的群体差异，本文按经营规模、受教育程度和是否加入合作社进行分组回归，如表 4 所示：

Table 4. Data from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4. 异质性分析结果数据

分组变量	组别	NQF 系数	样本量	组间差异检验(p 值)
经营规模	小农户(≤5 亩)	0.531***	162	0.312
	规模经营户(>5 亩)	0.549***	195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0.608***	165	0.028**
	高中及以上	0.494***	192	
合作社参与	未加入合作社	0.529***	172	0.041**
	已加入合作社	0.572***	185	

注：***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所有模型均包含控制变量。

规模经营户(>5 亩)的 NQF 系数(0.549)略高于小农户(0.531)，但差异较小，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赋能效应在不同规模经营主体间具有普惠性，但规模经营户由于具备更强的技术采纳能力和市场对接能力，其受益程度略高。受教育程度分组结果显示，初中及以下农户的 NQF 系数(0.608)明显高于高中及以上农户(0.494)。这一看似反常的结果可能源于以下机制：低受教育程度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更多依赖外部技术推广和社会化服务替代，新质生产力中的智能装备和社会化服务恰好弥补其技术短板，因此边际效应更大；而高受教育程度农户已具备较强的自主绿色生产能力，新质生产力的增量赋能空间相对有限。这一发现提示，技术推广应更加注重低技能农户的“兜底”服务。合作社参与分组结果显示，已加入合作社农户的 NQF 系数(0.572)高于未加入合作社农户(0.529)。合作社作为连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桥梁，通过统一技术标准、集中采购投入品、统一品牌销售等方式，有效降低了绿色转型的交易成本，增强了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果。

4.7. 交互项分析：调节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探讨教育程度和合作社参与对新质生产力赋能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引入交

互项，如表 5 所示：

Table 5. Data from interaction term analysis results
表 5. 交互项分析结果数据

变量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NQF	0.550*** (20.084)	0.623*** (15.230)	0.598*** (16.240)
education	0.024*** (4.367)	0.031*** (4.523)	0.028*** (4.198)
NQF × education	-	-0.089** (-2.456)	-
cooperative	0.037*** (3.708)	0.035*** (3.612)	0.041*** (3.845)
NQF × cooperative	-	-	0.076* (1.987)

模型(13)中，NQF × education 交互项系数为-0.089，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受教育程度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换言之，随着农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的边际促进效应递减。这一结果与分组回归的发现相互印证。

模型(14)中，NQF × cooperative 交互项系数为 0.076，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合作社参与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其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转化效率更高，这可能源于合作社在信息传递、技术培训和集体议价方面的组织化优势。

4.8.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极端值和增加固定效应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 6 所示：

Table 6. Data on the results of the robustness test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数据

检验方法	NQF 系数	t 统计量	R ²
基准模型	0.550***	20.084	0.577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等权重法)	0.536***	19.754	0.570
剔除极端值(1%缩尾)	0.533***	19.785	0.571
增加乡镇固定效应	0.545***	19.778	0.583
基准模型	0.550***	20.084	0.577

注：***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

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检验中，采用等权重法重新计算新质生产力指数，NQF 系数为 0.536，仍在 1%水平上显著，与基准模型基本一致。剔除极端值(1%缩尾)处理后，NQF 系数为 0.533，显著性未发生改变。增加乡镇固定效应后，NQF 系数为 0.545，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且模型解释力有所提升(R² = 0.583)。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郫都区为例，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技术采纳程度与社会化服务参与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从赋能维度看，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最强，制度保障次之，而技术赋能与效率提升的相对贡献较小。此外，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赋能效应存在明显的群体异质性，规模经营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户以及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受益更为突出。上述发现揭示了新质生产力驱动农业绿色转型的多维路径，为县域层面优化技术推广、完善产业链与政策保障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

5.2. 政策建议

基于郫都区这一领先示范区的实证结果，政策建议的适用范围首先指向与郫都区发展水平相近的都市近郊农业区；对于欠发达地区，建议优先解决基础设施和基本技术服务等短板问题。具体而言：

1) 强化绿色技术推广与智能装备普及。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农户参与的协同推广机制；加大无人机、智能灌溉等装备补贴力度；依托农业科技园区开展田间课堂培训，重点服务低学历农户；培育本土技术队伍，建立网格化服务体系，畅通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

2) 优化供产销一体化绿色产业链。从供给、流通、销售三端协同发力：供给端推广稻鱼共生等生态种养模式，发展订单农业；流通端建设冷链物流和集散地，降低损耗；销售端依托川菜产业园和电商平台，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形成绿色生产 - 品质溢价 - 激励强化的良性循环。

3) 完善政策保障与组织化参与机制。一是完善补贴 + 保险 + 金融三位一体政策：补贴转向绩效式差异化支持，扩大绿色农产品收入保险，开发绿色信用贷等专项产品；二是培育统防统治、农机作业等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服务替代降低小农户绿色生产门槛；三是发挥合作社带动作用，通过统一标准、统一采购、统一销售降低交易成本，并利用短视频、示范户等渠道加强绿色理念宣传，建立农户绿色生产档案，将绿色行为与补贴、信贷挂钩。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一是样本限于郫都区，结论外推需谨慎；二是横截面数据难以揭示动态演变；三是逐步回归法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未来可开展多县域比较研究、引入空间计量模型、结合案例方法深入剖析微观机制，以拓展研究深度与适用范围。

基金项目

本论文获西南民族大学 2026 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项目编号：YB2026030)资助。

参考文献

- [1] 魏崇辉.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 理论与改革, 2023(6): 25-38.
- [2]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 2023(10): 1-13.
- [3] 李春顶, 周燕妮. 赋能与革新: 农业新质生产力支撑农业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 社会科学辑刊, 2026(1): 128-137.
- [4] 高鸣, 杨新宇.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建设: 理论阐释与战略构想[J]. 经济体制改革, 2025(6): 180-190.
- [5] 金华丽, 杨蓁.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理论与经验证据[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6, 42(3): 51-62.
- [6] 崔雪锋, 孟泽, 张朝, 尹奇.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 地理科学进展,

- 2026, 45(2): 249-264.
- [7] 金书秦, 张哲晰, 胡钰, 杜志雄. 中国农业绿色转型的历史逻辑、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3): 4-19.
- [8] 仇焕广, 黄青. 农业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J]. 农业经济问题, 2025(2): 15-23.
- [9] 黄凤, 田泽, 李孝忠. 农业生产系统绿色转型的实现机制——基于“刺激-反应”模型的案例研究[J]. 世界农业, 2026(1): 88-102.
- [10] 郑军, 仲嘉维. 中国农村三产融合与农业绿色转型系统适配性评价及影响因素[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40(10): 2701-2717.
- [11] 罗光强, 宋新宇.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粮食主产区的动态 QCA 分析[J]. 兰州学刊, 2025(1): 183-195.
- [12] 于法稳.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 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全产业链优化路径[J]. 农村经济, 2026(2): 21-31.
- [13] 胡钰. 新质生产力加速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中州学刊, 2024(12): 30-38.
- [14] 戴小文, 漆莹, 蓝红星.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视域下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2(1): 87-95+202-203.
- [15] 赵向豪, 任雪文, 肖涵月, 孙培蕾. 新质生产力的农业绿色转型效应——基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视角[J/OL].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1-11. <https://link.cnki.net/urlid/11.3513.S.20260128.1418.008>, 2026-03-23.
- [16] 张可馨, 白永秀.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理论机制和实证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52(1): 167-178+289.